



【社会观察】

## 衣锦还乡的诱惑

□雨茂

我有一个朋友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一直反对购买小汽车。近年来他回家过年，有一件事总是让他心烦，因为老父亲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开车回家，自己儿子一家却坐火车，感到很没面子。他直言不讳地问儿子，你说自己混得好，为什么不买辆车开回来？论理，朋友名牌大学博士毕业，从事受人尊敬的职业——大学副教授，买辆车确实小菜一碟。况且家用汽车早就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但朋友就是不愿意跟这个风。他向我们抱怨，为什么成功的标志就是要买辆车开回家给别人看？他不信这个邪，但说服不了父亲。我劝他，父辈的想法我们改变不了，他们要的就是面子，从众心理也是大多数人的顽疾，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吧！谁都不能为别人活着，这里的“别人”也包括父母。

我老家在四川，2010年春节前，我回家参加舅舅的葬礼。一位远房的婶娘见到我就问，听说你在大学教书，一个月有两万元吗？我老实地回答说“没有”，连一半也达不到，她似乎很失望。我感到很失败，觉得辜负了长辈的期待，同时也很疑惑，难道那些打工的老乡收入都有每月两万元？不然婶娘为何要把我的工资定在两万元这道坎上呢？我带着疑问请教退休的大伯父，他从前是中学高级教师。他说，近些年，个别在外打工的人春节回家摆阔，在人前吹牛，让人误以为他们每年有几十万的收入，其实大多是“烧包”，不能信的。2010年春节前，老家一位在西藏打工的年轻人开着二十多万元的小汽车回家过年，行程两千多公里，沿途除了雪域高原就是崇山峻岭，非常惊险，他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才把车开回家。据我了解，他的购车款也是借来的，没过多久，为了还债，他就低价把车卖了。这件事迅速在老家成了笑柄，而此前，他还是老乡们羡慕的成功人士。

据我调查，近几年来，开车回家过年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成了一种时髦，而且渐成趋势。有从广东启程的，有从东北出发的，也有从福建、浙江动身的，最远的居然从新疆西部驾车回四川，往返八千公里。广东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同事开车回重庆过年，沿途出了三次车祸，轻微刮蹭就更多了，幸好人无大碍，吓得他再也不敢开车回家了。2015年春节，一位

老乡回家上坟，回来告诉我们，春节前后，平时空荡荡的县城连找吃饭的地方都困难，停车就更困难了，乡村公路上都出现了塞车现象，即使这样也阻止不了人们开车回家的决心。十年前有句歌词很流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的团圆梦想，不容我置喙。近些年来，这句话却悄然变成——有钱没钱，开车回家过年。这就值得人深思了。

中国人一向恋家，故土难离，即使暂时离开，也想着叶落归根，最后能够如愿的大多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比如结束宦海，荣归故里，或者发了大财，衣锦还乡。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还乡，最后总要修建漂亮的宅院，于是乎，大江南北就留下了许多气派的深宅大院，诸如张家大院、李家大院、王家大院……两千多年前，项羽那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就是最好的注解。不同的是古人建房证明自己，今人晒车显摆自己。村上春树曾说，有钱人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说自己没钱，难道没钱人就不能说自己没钱？这当然是反讽，需要从反面去理解的。许多人感慨，这个社会已经看不出谁有钱谁没钱了，因为没钱的开的车可能比有钱的还要好，所以我说，有钱没钱，开车回家过年。项羽的名言是不是应该改为：“不开车回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看见呢！”

可能有人要问，没钱怎么买车呢？

一位朋友在一个县级市做汽车销售，他向我证实，近几年春节前后，城里外地车特别多，一些人买不起新车，就买二手车开回家，为的是向父老证明自己有车人的身份。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内需，鼓励购买汽车，无论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贷款，甚至可以一车三贷（从三家银行贷款）。一分钱没有，照样可以把车开回家。我问他，首付怎么办呢？他说很简单，把价格定高一些就可以了，假如一辆车价值10万，那就定价15万，多出5万，首付还有余，反正风险不在销售商，也不在车主，都转嫁给银行了。这些措施不仅刺激了一些人的购车欲望，也让低收入者购车成为可能。即使财力不足或者需求不旺，也要买辆车开回老家，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问题是，要了面子，就失了里子，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香港百年文学史话②】

## 文学新旧并存中的「香港机制」

有着香火供养的庙宇，正是这种香港社会提供了「新旧文学并行」的环境。去过香港的人感受最强烈的是那里「有着时代尖端的摩天楼」同时也有「新旧兼容」的空间，新旧兼容。这种新旧并存的文学，反映出香港社会始终是个传统和现代并置的公民社会文化机制……「香港机制」也反映出香港社会始终是个传统和现代并置的公民社会文化机制……

□黄万华

1927年后，香港新文学逐步兴起，甚至有“独出冠时”之势，但并未发生中国内地“五四”时期新旧文学之间那样的激烈冲突。旧体文学阵营者对新文学崛起持开放态度：“研古者不忘乎今，研今者不忘乎古。新旧同和，不作偏畸，则新旧之学必有同时发扬光厉者。”新文学界也认为“新旧文学都各自有其本身的价值”。这使得旧体文学依旧有其阵地。

香港旧体诗词创作绵长而丰硕，据邹颖文不完全统计，香港写作旧体诗文的人数超过1700位，至少514位作者出版了808种旧体诗文集。而诗社兴盛的局面使旧体诗文的传播始终有着一定的空间，从战前的海外吟社、香海吟社、竹林诗社、北山诗社、正声吟社、千春社等著名诗社互相唱酬，到战后的硕果社、健社、岭梅诗社、青社、凤社、春秋诗社、披荆文会、南薰诗社、锦山文社等诸多诗社前后呼应，传统结社唱和风气始终不减。一些诗社寿命之长，令人惊讶，例如成立于1950年的健社一直活动至21世纪初。诗社的中坚力量，从南来文人为主转变到香港本土诗人，而上世纪80年代后“活跃于香港古典诗坛”的“后起之秀”。此种后继有人，说明以旧体文学创作倡导传统文化，始终延续不断。而新文学崛起后的旧体文学，突破古典文学“旧词汇旧立意”的藩篱，以“新词汇旧立意或旧词汇新立意，为求索之途，掺和新旧词汇，道前人未道之境”，使得旧体文学始终能在香港文学中占一席之地。

香港旧体文学也一直参与香港社会历史的进程，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空间。旧体文学并非“旧文学”，前述香港旧体文学一开始就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所用。香港文学与报纸副刊关系极为密切，而被视为“香港中文报刊设副刊之始”的《中国旬报》就系孙中山专门派到香港宣传革命的陈少白所办《中国日报》之“副刊”。之后早期旧式副刊，文体旧式（文言），但内容绝非“旧文学”所拘囿了。如当时副刊“最具特色”的《唯一趣报》有所谓为《中国旬报》原编辑郑贯公所办，潜行“力倡民族，疾唤国魂”、“拯救时之策，坚主权”之志。同时，旧体文学阵营也有向新文学转化的趋势。创刊于1924年的《小说星期刊》“内容丰富、空前特色”，虽以旧文体为主，但其创刊号曾借同仁贺词表明自己办刊宗旨：以借鉴“北美、西欧”等“文明国”“启民智”的“妙策、良谋”“息内争、御外患”“文明先行”，这样的办刊宗旨与新文学已无根本差异了。即便是文体，《小说星期刊》也开始显露新旧兼容的趋势。

这种新旧并存中的文学，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学运行其中的社会文化机制，使人得以窥见原先对我们陌生的“香港机制”，即香港社

会运行机制。

“香港机制”首先是港英当局的立场。港英政府有着稳定既有体制的殖民者立场。它历来支持现有文化建制中的传统、保守势力，例如1925年省港大罢工后，精通“唐话”（粤语与国语）、熟知四书的英人金文泰被大英帝国委派治理香港，他上任后就“倡议提高中文教育”，“一时翰林探花，高居讲席”。1927年香港大学成立中文系，教师全部是讲经史的清朝原太史和秀才。之后香港更是设立“孔教会”。但港英政府也需尊重本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也会给新思潮、新文化提供较宽松的公共空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报刊上常有从香港回来的报人、记者感叹，甚至大声疾呼香港的言论空间比上海宽松得多。各种新思潮在香港的传播并无阻碍。

“香港机制”也反映出香港社会始终是个传统和现代并置的公民社会空间，新旧兼容。1928年香港《墨花》刊文称：“书报上的文艺，就是新旧混合的、纯粹的新文艺，既找不到读者，而纯粹的旧文艺，又何独不然？”去过香港的人感受最强烈的是那里“有着时代尖端的摩天楼，同时也有着香火供养的庙宇”，正是这种香港社会提供了“新旧文学并行”的环境。“香港人生活于一种特殊环境之中，他较早接触西方事物”，却又处于“大清帝国残余礼制”中，“知识分子中，最受尊重的是几位有前清科第的翰林太史”。香港社会文化心理在上世纪20年代仍趋于保守，甚至被称为“十六世纪的城堡”，流亡香港的知识阶层多有“遗民”情结，“遗老文化”也得到保守商人的青睐。这些都提供了旧体诗文赖以安身的基础。但同时，香港也存在“从辛亥革命隐退来港的爱国志士带来的文化”和“受到上海、广州影响的市民文化”，这两种文化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而香港开埠后都市风气的侵袭，更使知识青年阶层出于创新求变而应和新文化思潮。

香港的语言环境也使人得以感受到“香港机制”。虽然英文在香港政界和商界通用，但汉语也一直通用于香港华人的任何阶层（香港居民98%说汉语、写中文），而香港的汉语是受粤方言支配性影响的中文书写的，虽然使得“五四”那样的借助语言变革实现社会变革较难在香港中文书写中产生历史性震撼，但汉语写作“发展而成本土身份的辨知与认同”，使得旧形式（文言文）文学逐步蜕变出新文体，与接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新文学兼容并存。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编辑：马晓迪  
本版编辑：孔昕